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4004

休闲空间的重建：休闲异化的历史逻辑与反思

李哲罕，林加骋，傅航颖

（浙江大学 哲学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休闲作为超越生存需要、指向自我实现的自由活动，历来被赋予崇高的伦理意涵，古希腊思想家更将其视作德性实践。伴随资本主义兴起，劳动被赋予新的价值伦理，推动了“劳动神圣化、休闲边缘化”的历史转向。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异化劳动与资本积累的双重挤压，造成劳动者与非劳动者双重意义上的休闲异化：劳动者被剥夺休闲时间，非劳动者的休闲亦走向扭曲。休闲的异化在空间维度得以具象呈现，休闲空间从自由场域退化为具有压迫性的规训装置。进入数字时代，休闲进一步被工具理性与消费主义裹挟，主体性被严重消解，休闲主体易在虚拟空间中迷失自我，休闲的内在解放价值随之失落。重建休闲空间、回归休闲本真意义，已成为当代休闲发展亟待回应的重要命题。

关键词：休闲空间；异化劳动；休闲异化；工具理性；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6)04-0025-08

休闲作为人类超越生存必需、追求意义的一种存在方式，从古至今都关涉着自由与幸福的议题。休闲一词带给人的原初印象总是与闲适、畅快挂钩。古汉语中，“休”意为“息止”，其字形结构“从人依木”[1]，形象生动地展现出人依靠树木歇息的图景，流露出人在劳作停歇之隙的舒适与安逸之感。从庄子的“心斋坐忘”到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中西方哲学对休闲的探讨呈现跨时空的共鸣，共同指向了休闲的本质——一种摆脱外在束缚、回归本真自我的存在方式。

休闲曾是思想启迪的沃土，亦是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对话的自由场域。然而，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新型劳动伦理造成了休闲的降格，使其沦为劳动的对立面，丧失了传统德性的崇高性并逐步走向异化。数字时代的到来，更使休闲异化不断加剧：它或被扭曲为消遣享乐，或沦为劳作之余的短暂调剂，休闲在当代社会近乎成为一种奢侈的想象。由此，休闲作为一种存在方式与空间实践，其价值内涵与存在形态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均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因此，从历史与理论双重维度出发，对休闲观念的历史演变与空间形态展开批判性回溯，不仅有助于揭示休闲异化与休闲空间变迁的内在逻辑，也对反思当代社会休闲的工具化倾向具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面对自由与休闲空间日趋逼仄的现实，重新审视现代休闲的存在价值，既能够回应数字时代关于人的自由与主体性的根本关切，也有助于在现实语境中探寻重建休闲空间的有效路径。这一重建，不只是在物理层面打破空间区隔，更是让休闲空间真正成为主体实现自我的场域。

收稿日期：2026-01-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学启蒙’研究”（20CZX045）

作者简介：李哲罕，男，浙江临平人，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批判理论。

一、休闲的降格：从德性实践到非自由困境

休闲 / 闲暇作为古希腊哲学产生的必要条件，为理性思辨提供了现实基础与精神空间。从词源学上考察，休闲（leisure）源自拉丁语“licere”（意为“被允许”），表示“摆脱事务束缚，空闲，未被占用”[2]之义。在希腊语中，表达闲暇时间、休息等意义的词为“skhol ē ”，随后其词义逐渐演变为“school”（学校）[3]。该词义的嬗变轨迹折射出古希腊文化中知识教育活动与休闲活动的深度联结。当时的贵族阶层因为物质生活的优渥，能够从容地从生存压力中解放出来，转而关注内心世界秩序的构筑与内在本真意义的追寻。这种需要长期专注投入的沉思活动，从根本上有赖于摆脱实用目的支配的闲暇状态。在当今社会，如何平衡劳动与休闲的关系？比如，在亚里士多德的价值体系中，沉思就被视为“最高等的一种实现活动”[4]305，关涉着个人最高的幸福，而幸福又“似乎包含着闲暇”[4]306。

对闲暇与沉思的尊崇，不仅推动了个体对世界的深度思索，也塑造了一种独特且自由的休闲空间形态。这种自由首先表现在外在空间的选择上。希腊三贤中，苏格拉底“习惯于在集市上、钱庄柜台边或其他地方”[5]与许多人进行对话。这种对话在空间上不限场所，在对象上不分阶层。柏拉图创办的学园（akad ē meia），选址于雅典西北郊的橄榄树林，教学活动融于自然之中。其教学方式灵活，课程没有预先制订的大纲；有时还举办公开课程，听众甚至包括了农夫[6]。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逍遥学派”，因其经常与学生边讲课边散步于走廊与花园之间而开创了“散步的哲学”。古希腊时期，休闲空间具有广阔、流动、开放的特征，人与自然的界限没有像现代社会那样泾渭分明，这就使得古希腊的哲学探讨自由且开放。空间的自由不仅体现在外在场所的选择，更体现在内在精神世界的广袤与自足。沉思作为最高的休闲活动，是一个完满自足的过程。“一个在沉思的人，就他的这种实现活动而言，则不需要外在的东西。”[3]309 当时的自然哲学家们，通过观察自然界建立起了各自的学说体系，其哲学本质上是主体内在秩序原则的外在化呈现。主体越沉思，就越有“万物皆备于我”之感。因此，彼时的空间形态于外呈现流动开放之态，于内兼具广袤与充盈之质，实为哲学沉思的理想场域。

休闲一词自使用伊始，就与劳动不可分割，彼此构成一对辩证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随着时代发展逐渐发生了价值上的分野与换位。劳动与休闲都是人的必要生存方式，但在古希腊的价值观里，休闲 / 闲暇承载着一种更为崇高的德性传统。在古希腊人看来，劳动只是一种“被外物所役，只可视为遂生达命”[7]417的手段，而闲暇才是过上卓越人生的必要条件；人生之所以“不惜繁忙，其目的正是在获致闲暇”[7]416。这种价值判断同样映射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理想城邦的公民被认为应能够参与公共事务，而那些终日劳作的农民则因缺乏闲暇而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7]372。简言之，古典时代的休闲 / 闲暇是理性思考与政治参与的基础，代表着崇高的德性；而劳动被认为是卑微的、压抑的，只是一种维系生存所必需的手段。

古典时代所建构的休闲与劳动的二元关系，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而被彻底颠覆。资本逻辑与新教伦理的介入，促使社会对劳动价值进行重估，并直接导致休闲观念的式微。首先，资本主义对财富与效率的狂热追求重新定义了劳动的社会价值：劳动不再仅是维系生存的基础性活动，转而成为资本增殖的核心环节，象征着经济成就与社会身份；休闲则被视作多余与怠惰的表现。其次，宗教改革后兴起的新教伦理赋予劳动以神圣的宗教意涵：闲暇中的沉思不再是趋近神性的至高活动，唯有勤勉劳动方能获得上帝在现世的恩典与荣光。在过去，匠人的技艺活动与行商的经营活动一律被贬作“贱业”并被认为“有碍善德”[7]372，但新教伦理（在这里以加尔文宗为主）将这种世俗化的职业活动上升至“天职”（beruf）的地位，劳动被认为是人们应尽的义务[8]52-60。这就彻底消解了过去人们对待劳动的轻视态度[8]。此外，“上帝预选论”（gnadenwahl）进一步稳固了这种劳动伦理。预选论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焦虑与不安，迫使他们全身心投入生产劳动与资本再生产活动之中，将财富积累视作被上帝拣选的外在证明，以此缓解内心

的惶恐与焦灼。于是，劳动在社会与宗教层面被抬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传统中作为德性实践的休闲，则被贬斥为“怠惰与享乐”[8]151。本雅明·富兰克林“时间就是金钱”的格言，极大程度上展现了时间（包括休闲时间）被彻底经济化的新伦理本质。概言之，资本逻辑的盛行、新教伦理的内化，共同促成了劳动神圣化与休闲边缘化的历史转变。

二、资本逻辑导致休闲异化：从异化劳动到空间压迫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逻辑与新教伦理的耦合的确造就了劳动地位的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彻底得到解放，如韦伯所言，“新教的禁欲又视企业家的营利为‘天职’，从而正当化了这种特殊劳动意欲的剥削利用”[8]183-184。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劳动逐渐被机器和资本所控制，变得更加工具化和异化。异化（entfremdung）是人类在高度资本化的社会里与自身本质产生的疏离或对立，是“不应有”的状态。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地构建了“异化劳动”理论框架。从休闲学视角看，异化不仅存在于劳动过程，同样体现在休闲领域，二者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首先通过异化劳动的三重内涵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者的系统性支配。其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异化。劳动产品作为被工人制造出来的“凝固的劳动”，形成之后却反过来压抑“鲜活的劳动”——工人自身，两者之间的关系变成“异己的对象的关系”[9]157，于是出现了“工人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9]158 的生存悖论。其二，劳动者与劳动过程异化。劳动从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沦为使人“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9]159 的强制劳动。其三，劳动者与其类本质异化。人作为“类存在物”，本应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确证自己的“类本质”，但属于“类生活”的生存生命活动已倒退为肉体的苦役，于是人的社会本质也逐渐被自然本能所吞噬[9]161-163。最终，劳动者在多重异化下变得面目全非，被日复一日的劳作消磨了个性、湮灭了活力。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了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遇的非人化待遇。肮脏恶劣的生存环境、闭塞拥挤的栖息空间、惨无人道的工作时长与逐年减短的平均寿命，使得工人阶级被笼罩在无边际的厄运之下。恩格斯将这种无情剥削称作“隐蔽的、阴险的谋杀”[9]409。劳动者的主体性在强制劳动中被抹杀，其内心的痛苦并不会随着工作的结束而消失，反而蔓延至工人们的“休闲生活”（劳动者已经丧失人的基本尊严，更遑论享有休闲），造成休闲异化。劳动者在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后已经精疲力竭，只能借助饮食、睡眠、纵欲、酗酒等来满足简单的生理需求，以便于投入第二天的异化劳动。于是，休闲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工具性环节，劳动者在“劳动—休闲”的循环中陷入更深层的困境。

异化劳动的终极形态是人与人相异化，其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物化（verdinglichung）。当个体逐渐背离自己的“类本质”时，处于社会关系中的群体互动也随之扭曲，于是每个人都开始“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来观察他人”[9]164。这种异化的尺度最终通过社会关系外化为阶级对立。在这里，马克思揭开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面目，即当工人（劳动者）遭遇极力剥削时，有一群“他人”（资本家 / 非劳动者）正坐享其成，如此，人自身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9]165。对劳动者而言，他们被迫将劳动产品与劳动能力让渡给资本家，从而让自己受压迫；对非劳动者而言，他们通过剥夺剩余价值，将工人多出的劳动时间转为自己可支配的休闲时间，形成对休闲的特权占有。若继续追问：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受益者，非劳动者是否拥有美好充实的休闲体验？答案是否定的。当异化劳动深化为阶级对立时，非劳动者的休闲同样陷入异化困境。一方面，非劳动者的休闲是相对的、根基不稳的，他们对劳动者表面上的支配关系蕴含着根本的脆弱性。如同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所指出的，奴隶能够在改造外界的对象化劳动中觉醒自我意识，实现自我确证，从而在“统治－恐惧－陶冶”三个环节中意识到自己的自为存在[10]127-132。虽然异化劳动背离了“陶冶”的本真意义，但当劳动者（奴隶）在极端的异化状态中意识到

自身健康持续恶化，并且奴隶身份会通过代际延续给后代时，个体的生存困境便转化为集体性的觉醒认知，催生出具有革命力量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非劳动者在剥削他人的同时，自身也被贪欲所驱使，陷入对资本积累和休闲消费的无限追逐之中。非劳动者若想尽可能延续自身的休闲特权，就必须持续强化对劳动阶级的剥削和统治。然而，这种统治关系并非单向度的，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表明，有闲阶级的休闲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炫耀性消费，他们“消费的财物的品质也是经过挑选的，是特殊化的……是任情消费的，是挑最好的消费的”[11]，并以此来彰显社会地位。一旦离开这些外在的掩饰，有闲阶级精心建构的身份认同便会瓦解，这在 20 世纪的经济大萧条中暴露无遗。因此，从压榨劳动者到挥霍消费，非劳动者都在被无止境的欲望推着走，从而丧失了主体性。于是，劳动与休闲的双重异化彻底消解了休闲在古典时代所承载的崇高德性与精神超越性。

劳动与休闲的双重异化在物理维度上则展现为空间上的异化。工业革命不仅重塑了社会生产关系，更改变了社会空间结构的布局。恩格斯认为，工厂的设立，要求工人们共处同一个建筑物中进行集中劳动；工人便以工厂为原点形成居住区，随后吸引来各行各业者，从而形成村镇；当原有工厂规模不足时，会吸引更多工厂入驻，村镇演变为小城市；小城市发展成大城市[9]406。于是，工业革命塑造了高度密集的城市景观，原先连贯通达的空间被严明地划分为具有各自功能边界的场域单元。正如有论者提及的“格子”[12]159-168 概念，“人被严格地限定在一个格子中……只能按格子的要求行动，他没有超越格子的额外的视野和能力”[12]161。这种限制使劳动关系被还原为简单的空间组合：对于工人（劳动者）而言，眼前的工作台就是他的“格子”，工人只是盲目地进行机械化操作，而对其生产商品的最终形态可能一无所知，他只是生产环节上的一个“点”。工人与工人之间通过传送带串联成一条福特“流水线”，最后所有工人都被困在工厂的“大方格”里。空间的功能从容纳人异化为限制人、规训人。此外，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空间皆呈现出强烈的局促感。“250 万人的肺和 25 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消耗着大量的氧气。”[9]409 工业城市高楼密布，阻隔了空气流通，机器燃烧与垃圾腐烂所产生的有害气体，使工人身处恶劣的工作环境。在生活空间上，工人只能栖身于结构简陋的地下室或是拥挤脏乱的贫民区，其生存空间“比一个苦役犯人所应占的空间还要小”[13]。工人空间的逼仄绝非单纯的物理局限，其背后暗含深刻的制度性根源——资产阶级（非劳动者）借助空间资源实施阶级压迫。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从不是中性的背景，空间不仅“表达权力，而且它还以权力的名义继续进行压制”[14]527。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空间压迫实际上是一个“三分”的过程，即（地理上）划分、（组织上）分散、（身份上）区分。首先，非劳动者通过地产开发、金融运作等投机性手段，哄抬城市核心区域的地价，将其打造为“决策、财富、权力和信息的中心”[14]552，使低收入的劳动者不得不向城市边缘迁移，实现横向平面上的地理划分。此外，现代建筑的出现使高层空间成了权力与资本积累的象征，非劳动者通过电梯等技术手段占据高层空间，达成纵向上的空间分隔。其次，如上述所言，工人的觉醒对资产阶级而言始终是一个潜在威胁，特别是工人作为共同体所催生出的阶级意识，会引发对资产阶级的空间挤压与冲击（1848 年欧洲革命就是一个例证）。所以，统治阶级通过城市规划重塑街道布局，令聚居的工人社区“原子化”，分散劳动者之间的社交网络，以防止其形成革命力量。例如，19 世纪奥斯曼主持的巴黎改造工程，用宽街大道取代陋屋窄巷，以改善城市的卫生与交通。有阴谋论者揣测，该规划是出于方便军队调动的政治动机，这种观点因缺乏直接证据而无法验证。然而吊诡的是，这种宽敞的道路设计的确帮助政府军于 1871 年成功镇压了巴黎公社的起义。正如居伊·德波所言，“城市规划就是捍卫阶级权力的不间断任务的现代实现”[15]。最后，非劳动者通过打造专属空间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劳动者进行身份上的区分。在生活空间中，上述提到的“有闲阶级”通过炫耀性消费，将住宅布置成一个奢侈品空间，且与仆人使用的区域严格区分开来，通过这种空间差异反映彼此身份地位的差距。在公共空间，他们设立了高端俱乐部、豪华宴会等高门槛的空间场所，并对参与者进行严格的筛选，来维护有闲阶级社会背景的一致性。在意识形态空间，统治

阶级通过教育系统及文化象征，将特定审美趣味建构为合法化的高雅文化与普遍有效的评判标准，从而实行“文化专断”[16]。总之，这种制度性、等级化的空间压迫现象，不仅实现了对劳动者的规训与排斥，也体现了非劳动者的扭曲与病态，更深层地反映出社会结构中权力与资本的运作机制。

三、数字时代加剧休闲异化：从工具理性到虚拟逃逸

数字信息时代，资本逻辑发展至极致，休闲异化也随之达到顶峰。当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已不再如资本主义早期那般因对劳动的直接崇拜与对资本积累的狂热追逐而公然贬低、排斥休闲，而是借助数字技术，以更为隐蔽且深入的方式重塑了现代人的休闲生活：健身房自拍沦为获取社会认同的工具，拆盲盒的惊喜异化为收藏焦虑，知识付费则使学习被资本与功利逻辑所驱动。因此，即便不借助学理分析，仅从日常经验便可直观感知：休闲正日益沦为工具理性的附庸。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整全的休闲“涉及的不仅仅是在消极意义上人自身的恢复，也还有在积极意义上人自身的实现，可惜它在现代社会是处在被抑制甚至是被支配的地位”[17]66。换言之，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休闲从舒缓压力、追求自我实现的方式异化为工具理性主导下的麻木活动。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个体的日常选择中，还深刻地呈现在消费生活与文化生活等社会层面，表现出背离休闲原初意义的特征。

在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生活中，个体的自我认知在数字技术的统摄下被异化，其主体性在虚假休闲中被日益削弱。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使得现代社会流行着“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18]。于是，个体痴迷于技术繁荣的表象，导致其休闲活动呈现出对数字技术的过度依赖。个体一旦拥有自由时间，便极少投入阅读、体育锻炼等有益于身心发展的活动，反而多以机械、惯性的方式流连于各类短视频平台，依靠无意识的指尖滑动，获取每十几秒即时更新的浅层快感。与此同时，大数据算法持续强化个体既有偏好，使其陷入缺乏深度思考与自主批判的被动状态：思维日趋扁平、判断渐趋单一、表达愈发匮乏。这种过度的整齐划一正是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所要批判的：“非同一性是同一化的秘密目标，它是解救的目标……消除同一性现象的力量是思维本身的力量。”[19]个体因丧失思维能力，在被动的休闲方式中陷入空虚与无聊。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无聊，尚能使人从日常琐碎中抽身，直面存在的空洞与虚无，进而引发对自身存在本质的根本追问，构成通向本真存在的重要契机；而现代人的无聊，实则是对自身存在本质的逃避——人们试图在互联网世界中寻找栖身之地，却被无穷无尽的信息流裹挟，为博取社交媒体上他人的认可，最终将自身客体化。消费主义经济的盛行，使得休闲异化全面蔓延至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向。

主体性的削弱使公众愈来愈受到各种“他在力量”的裹挟，这率先呈现在审美领域。休闲活动与审美意识密不可分，正如有论者认为，休闲是“人的自在生命及其自由体验状态”，审美则是这种状态的“最高层次和最主要方式”[20]。人自古以来就对美有着追求，现代社会中消费至上观念的蔓延却使这种追求发生了畸变。企业与商家借助数字媒体宣传，刻意将“美”打造成一种少数人拥有的特质，营造一种“稀缺感”，从而诱使公众通过消费来竞相追逐和模仿这种“理想化”的形象，于是审美标准被消费主义侵入与重塑。另外，消费主义不仅使休闲体验商品化，也模糊了休闲与消费的界限。商品化即将抽象的休闲体验浓缩成一个个具象的休闲商品。例如，阅读体验被包装为墨水屏阅读器，露营体验被捆绑于高端露营装备。这让人们产生“设备拥有”等同于“对某项活动的投入体验”的错觉，从而激起购物欲望。讽刺的是，电子阅读器最后沦为盖泡面的工具，人们真实的休闲能力因缺乏实践而退化。同样地，休闲景区的终端永远是文创商店与大同小异的商业街、娱乐商场，它们通过路线设计与实景打造留住客源。在这里，休闲与消费的界限被模糊，不同空间场景的衔接和纠葛“强加了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21]3，人们似乎被本能驱使般，“逻辑性地从一个商品走向另一

个商品”[21]3-4。于是，整个社会在经济、文化层面皆呈现出虚假休闲的泛滥态势。

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相似，当代空间延续了传统物理空间的资本逻辑渗透，这从关于现代社会虚假休闲的描述中便已能明晰地感知到。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社会借助技术发展衍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空间形式——虚拟空间（数字空间）。有论者指出：“我们正见证着一次划时代的、前所未有的迁徙，从牛顿的经典物理空间到作为一种新环境的信息圈”[22]112；“一个更加无界、无缝、同步（时间上）、不受地域限制（空间上）和相互联系 (互动层面) 的信息圈”[22]191。虚拟空间对人的诱惑无疑是巨大的，地球上发生的任何事，都能通过光纤宽带以迅捷、完整且形象的方式展现在眼前；虚拟空间甚至被称为“没有空间的地方”[23]。不过，尽管虚拟空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无界性，但它并非独立存在，其依然与现实世界保持着共生关系。于是，现代人的休闲活动也在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下呈现出“虚实二重性”。人们对于现实世界最深度的探索莫过于旅行，但这也在虚拟空间的介入下发生了变质。旅行者们从过去手捧一本《孤独星球》探索未知的土地，到如今社交媒体上千篇一律“模板式”打卡脚本。主体在旅程中收获的私密又细腻的感受，也被符号化为社交媒体上的点赞数与浏览量。这势必造成价值取向上的本末倒置。更进一步来看，人们对虚拟空间的过度投入正在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隐私泄露与网络暴力等）。更为严重的是，长期沉浸于虚拟互动（如游戏）会弱化主体对真实世界的意义感知，使其逃避现实。如今，随着头戴式 3D 空间显示设备的研发，虚拟空间的沉浸感与真实感皆大幅度提升。技术革新已从根本上重塑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无论虚拟技术带来的是更多的控制抑或更多的自由，人类社会都毫无疑问地迈入了“Z 世代”乃至“阿尔法世代”。在此背景下，回归康德“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伦理命题，不失为一条更为稳妥的路径。唯有真正彰显个体主体性，方能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时代中，更具意义地面对自我与世界。

四、休闲空间的重建：当代休闲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

如前文所言，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到现代社会中普遍弥漫的工具理性，它们不断加剧着休闲活动及其空间维度的异化。正如有论者所言，“休闲活动的外在形式性和内在本真性两者俱丧”[17]67。这意味着，人们不仅难以真正享有休闲，还缺乏健康、开放的休闲空间。因此，如何重建自由的休闲空间，恢复休闲活动的本真意义，已成为当代休闲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休闲空间的重建在最原初和最直观的层面上，即对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进行拓展与改造。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曾论及各种社会机构（监狱、学校、军队）对人的管理与规训。诚然，在现代的相关建制下，现代社会已不再充斥着这种无端的暴力与禁锢，但是形形色色的空间划分同样是在“规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这是贯彻纪律的保护区”[24]。在这里，我们并非要打破这些规范，因为其对社会运作的稳定性至关重要；我们力图在这些方正严明的空间分割线上，或设计开放灵活的休闲空间以满足不同人群的活动需求，或将更多的自然景观嵌入城市环境中，或设计合理的无障碍设施以便年老者与残疾人使用，等等。如此一来，当我们把视线聚焦于城市的某个区域时，工作与休闲的场域就是流通的、可达的。

正如有论者认为，休闲空间与作为场所的空间，二者不可混淆，更不能等同[25]19。场所的空间相当于为人的休闲行为提供一个物理学意义上的容器与环境，而休闲空间“是与人的休闲行为及其伴随出现的气氛——其中充溢着人的感受、体验和情感——直接相关。也就是说，是因为人的休闲行为而使它成为具有相应休闲属性和意义的休闲空间”[25]19。例如，人们在樱花季时坐在树下野餐交谈、唱歌奏乐，“花—景—人—音”就构成了唯美的无形的休闲空间。但倘若每棵树下都架起扶梯，人人争先恐后抢占最佳机位，那么，即使身处相同的休闲场所，休闲的意境也荡然无存。所以，休闲空间并非单纯客观性的空间，它还是意义空间、情感空间和发生性空间。休闲空间的重建最终需要回到休闲主体——“人”身上。现

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已有力地印证了韦伯关于“铁笼”[8]147-190 的预言。尽管理性化带来了效率与产出，但也把个体严丝合缝地整合进社会系统，使其逐渐成为其中的一个部件。在交往中，我们看待、评价他人的方式总是以职业、财力等外在因素为基准，却越来越少关注到对方作为主体——“人”的鲜活与生动。金钱与社会地位作为一种“头衔”，本就可以在不同人之间流转、替换，但现代社会却反其道而行之，将人的个性磨平并安插进社会的死板秩序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尼采哲学中“日神精神”（代表节制、理性、秩序）贯彻到极端的结果，人们日常生活中“班味缠身”的自嘲生动地表征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鉴于此，代表情感、自由、冲动的“酒神精神”应被适当地引入。例如，在个体维度，鼓励人们诉诸感性与自然的表达；在公共维度，维护平等沟通与开放包容的公共空间，构建主体性之间的和谐联结等。这些打破死板、沉闷的冲动，正是人作为生命体而保有灵性的表现。

休闲空间的重建并非一朝一夕，亟须我们从根本上反思劳动与休闲的关系以及现代社会对个体生活的影响。只有鼓励多样化的休闲方式，重新构筑休闲主体（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休闲体验才能回归到本真意义上的休闲体验。这既是对理性过度工具化的深刻挑战，也是我们回归到马克思所称“完整的人”[9]189 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 许慎 . 说文解字：第 1 册 [M]. 汤可敬，译注 . 北京：中华书局，2018：1222.

[2] Harper D. “Etymology of leisure.”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EB/OL]. [2025-05-10]. https: //www. etymonline.com/word/leisure. Accessed 3 May，2025.

[3] Harper D. “Etymology of school.”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EB/OL]. [2025-05-10]. https: //www. etymonline.com/word/school. Accessed 3 May，2025.

[4] 亚里士多德 . 尼各马可伦理学 [M]. 廖申白，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 柏拉图 . 柏拉图全集：1[M]. 王晓朝，译 . 增订本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

[6] 斯塔伊克斯 . 书籍与理念：柏拉图的图书馆与学园 [M]. 王晓朝，译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16-117.

[7] 亚里士多德 . 政治学 [M]. 吴寿彭，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8] 马克斯·韦伯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M]. 简惠美，译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黑格尔 . 精神现象学：上卷 [M]. 贺麟，王玖兴，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1] 凡勃伦 . 有闲阶级论 [M]. 蔡受百，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8.

[12] 汪民安 . 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92.

[14] 亨利·列斐伏尔 . 空间的生产 [M]. 刘怀玉，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15] 居伊·德波 . 景观社会 [M]. 张新木，译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109.

[16] 布尔迪约，帕斯隆 . 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 [M]. 邢克超，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3.

[17] 李哲罕 . 现代社会批判与审美批判；论休闲学的两条可能路径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2).

[18] 马尔库塞 . 单向度的人 [M]. 刘继，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3.

[19] 阿多诺 . 否定的辩证法 [M]. 张峰，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128.

[20] 潘立勇 . 休闲与审美：自在生命的自由体验 [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5(6)：5.

[21] 鲍德里亚 . 消费社会 [M]. 刘成富，全志钢，译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2] 弗洛里迪 . 第四次革命 [M]. 王文革，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23]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 . 数字化生存 [M]. 胡泳，范海燕，译 .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94.

[24] 福柯 . 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 [M]. 刘北成，杨远婴，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60.
[25] 庞学铨 . 休闲学的八个基本范畴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5，30(2).

Reconstruction of Leisure Space: 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Reflection of Leisure Alienation

LI Zhehan, LIN Jiacheng, FU Hangy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Leisure, as a free activity that transcends survival needs and points towards self-realization, has always been endowed with noble ethical implications. Ancient Greek thinkers even regarded it as the practice of virtue. With the rise of capitalism, labor was endowed with new value ethic, driving the historical shift towards “the sanctification of labor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leisure”.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dual pressures of alienated labor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led to the alienation of leisure in a twofold sense: laborers were deprived of leisure time, and the leisure of non-laborers also became distorted. The alienation of leisure was concretely manifested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 as leisure space degenerates from a realm of freedom into an oppressive disciplinary apparatus. In the digital age, leisure is further ensnared b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consumerism, resulting in a severe dissolution of subjectivity; leisure subjects are prone to losing themselves in virtual spaces, and the intrinsic emancipatory value of leisure is consequently lost. Reconstructing leisure space and recovering the authentic meaning of leisure have thus become pressing issues that contemporary leisure development must address.

Keywords：leisure space; alienated labor; leisure alienatio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subjectivity

责任编辑：黄声波